
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文化建设的 主要力量及其作用机制

崔世广*

内容提要：围绕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建设问题，存在着各种势力，也提出过各种不同主张。这些势力和主张的相互对立和统一，构成了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文化建设的丰富画面。本文在着重考察日本政府、知识分子和民众的作用的基础上，从相互作用的观点出发，对日本文化建设的机制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现代化 文化建设 政府 知识分子 民众 作用机制

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建设，是在各种势力和主张相互对立、相互协调或相互促进的合力的作用下展开的，而日本文化建设的各种局面和成就，也是各种势力和主张相互作用的结果。

大体来讲，围绕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建设，存在着三种基本的力量，即政府、知识分子和民众。可以说，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文化建设的各种结果，都是这三者相互作用的产物。下面，主要考察日本政府、知识分子和民众在这种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和影响，然后从相互作用的角度探讨日本文化建设的机制。

一 政府的作用

日本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制定者，并有国家机器做后盾，因此，在日本近现代文化建设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由于政府所担当角色和所处立场的关系，其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带有自己的明显特点。

日本政府在近现代文化建设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定文化政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策，规范和引导文化的发展上。从日本整个近现代的历史来看，作为日本现代化的领导者，日本政府制定文化政策时的最大特点，就是总是以如何推动和保证现代化的顺利进展为出发点。换句话说，就是总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考虑文化问题，来制定文化政策。其结果，使日本政府的文化政策带有浓厚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色彩。

文化建设和文化政策首先服务于现代化，使日本政府在思考和制定文化政策时体现出现实感和平衡感。一般来讲，日本政府的文化政策和措施中，兼具开明与保守、进步与落后、合理主义与非合理主义的两种要素。当然，这样的文化政策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侧重点有所不同，并且出现过重大失误，自是不待言明的。

明治维新时期，由于面临西方列强的威胁和压迫，明治新政府的文化政策较多地具有文明开化的色彩。明治维新的领导者，是当时日本既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又具有敏锐的头脑和很强的政治能力的一批政治精英。在明治新政府的指导层中，一般都具有这样的认识：西方文明优于日本文明，要想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必须大力学习、移植西方的文物制度。他们认为，“以我东洋各州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竭尽我国之善美”，“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皆“超越我东洋”，因此，必须将西方的“开明之风”和法律制度等移植到日本，使日本迅速进入“开明各国之行列”。^① 维新领导人的上述认识，对明治初期的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明治新政府在取得鸟羽伏见之战的胜利后，发布“五条誓文”，将新政的基本精神明示于世界。其中有“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破旧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等内容。之后，明治新政府将文明开化作为基本国策，积极导入西方近代思想和学问，大力推行欧化主义政策，这在明治初期成为文明开化的新风潮。沿着这条路线，明治新政府积极进行社会制度方面的改革，取消封建等级身份制，使日本原则上成为“四民”平等的社会，而教育上则模仿欧美颁布了“学制”，确立了近代教育体制。

但是，明治领导人一直也没有忘记利用天皇的权威和传统文化及宗教信仰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他们频频使用“夺玉”的策略，将

^①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328、329页。

天皇的权威作为工具来利用，以为其行动寻求合法性和正当性的依据，这在王政复古的宫廷政变中达到了顶峰。他们为了控制和收揽人心，利用民众的信仰，强调武士道伦理。他们还采取动员民众参拜当地守护神等手段，强化民众的传统宗教意识和共同体纽带意识。这种利用非合理主义来教化民众，调集民众的能量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思想，与开国进取的文明开化的思想相辅相成，构成明治领导人的思想的两重性格。与上面的积极模仿西方近代文化实现现代化、开国进取的精神相反，政府在发布“五条誓文”的同时，对一般庶民发布了“五榜揭示”，规定应正“五伦”之道、禁止徒党和强诉、禁止基督教等。另外，新政府还倡导祭政一致，模仿古代律令体制再兴神祇官，打出了以神道为政教一致的基调的方针。沿着这条路线，政府于 1870 年进行“大教宣布”，还制定了神社制度等。这反映了明治政府既想利用传统调集民众的能量实现现代化，又想利用传统压制民众的保守、封闭的一面。之后，政府于明治十二年（1879 年）制定了《教学圣旨》，于明治十五年（1882 年）颁布了《军人敕语》，也是位于其延长线上的。

到明治中期以后，日本基本摆脱了近代初期所面临的民族危机，过渡到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从 19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末，相继制定和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 年）、《教育敕语》（1890 年）和《明治民法》（1898 年），分别从政治法律、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规定着日本近代文化的基本内容和性格。

《帝国宪法》采取钦定宪法的形式，将国民置于臣民的位置。其中虽然规定国民在法律范围内有信教、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规定个人所有权不可侵犯，开辟了国民通过议会参政的道路，具有某种近代的内容，但作为宪法的基本，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总揽统治日本的大权，并拥有制定官制、任命文武官员的权限。这样，官吏就成为天皇的官吏，他们不是对议会负责而是对天皇负责。另外，规定天皇有召集、解散议会的权力，而且将陆海军的统率、宣战、媾和的权力也置于天皇的大权之下，使统率权从议会、行政等独立出来。从宪法的内容可以看出，帝国宪法的原则是主权在君，而且在此原则之下采取了行政机关的权限大于立法机关的结构。这样，就把近代民主主义的因素纳入到传统框架之中，使宪法在具有近代体裁的同时，具有浓厚的前近代的性格。

《教育敕语》写着：“朕唯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厥美。此乃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在于此。尔臣民应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而扩大公益，开展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不仅为朕之忠臣良民，亦足以显扬尔祖先之遗风焉。”^①可见，《教育敕语》中虽也有近代色彩的内容，但其核心仍是传统的忠孝思想，“爱国”被置于“忠君”、“尊王”的基础之上。

最后，在经过修改的《明治民法》中，财产篇仍是以法国式的天赋人权论为基调，具有极为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在这里，法律上完全平等的“人”所构成的物权、债权关系的基础是权利和义务关系。但是，身份篇的性质却与之不同。在这里，人们之间的关系仍被作为户主与家族成员、父与子、夫与妇的关系来把握。而且，各种身份上的权利不是来自天赋而是分封于国家。由于财产篇的规定是在身份篇的规定的人及人际关系上才能进行，所以财产篇的内容与身份篇的内容并不是并立的，而是有主从、上下之分的。这样，在《明治民法》中，欧洲近代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因素，被置于了传统家族主义的基础之上。两种要素相互矛盾又相互补充，构成国民的私法生活。

战后，日本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战后初期，在美国占领军的主导下，日本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民主化改革，并相继制定了《日本国宪法》（1946年）、《教育基本法》（1947年）和“新民法”（1948年）。《日本国宪法》确立了“主权在民”、“放弃军备和战争”、“保障基本人权”的原则，规定天皇仅是日本国的象征，其地位由“主权所在的日本国民的意志决定”，宣称永远放弃战争，永远放弃“以武力威胁和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手段”，并规定“国民享有的一切基本人权不能受到妨碍”。^②《教育基本法》是按照新宪法的精神确立的，该法规定教育的目的是“为建设文明和有文化的国家，为世界和平与福利事业做出贡献，教育必须以陶冶人格为目标，培养和平

^① 《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明治维新的再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82页。

^② 参见《简明日本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655页。

国家与社会的创造者，希冀真理与正义，尊重个人价值，注重勤劳与责任，充满自主精神的身心健康的国民”^①。“新民法”也是根据新宪法的精神，对旧民法特别是家族制度的有关内容进行了重大修改。以上这些基本法律，规定着战后日本文化的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的基调。

另一方面，随着战后欧美文化的大举涌入，日本政府也开始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弘扬，如 1950 年颁布实施《文化财产保护法》就是明显的一个例子。特别是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人民自信心的恢复，日本政府在保护传统文化、提升民族精神的凝聚力方面更是不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这主要表现在大力保护茶道、花道、歌舞伎等传统艺术，扶持和奖励海内外的日本文化研究，加强日本文化的海外输出，提高日本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成立于 1972 年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在这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 年中曾根上台后，与“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政治目标相联系，日本政府积极推行教育改革，强化国家观念和爱国心教育，加强向海外宣传日本文化，使日本的文化政策带有浓厚的新国家主义色彩。

由以上可以看出，在日本近现代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过程中，日本政府的作用举足轻重。日本政府制定的文化政策，规定着日本文化发展的方向和文化建设的基本性格。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处理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即如何利用两者为日本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一直是日本政府思考的重大课题。虽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历史环境下，日本政府的文化政策的侧重有所不同，但基本不变的是，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和政治需要出发，尽量利用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两者来为现代化服务，来为国家的总体目标服务。这就使得日本近代以来的文化政策，同时兼备西方与日本、传统与现代、开明与保守的双重性格。这种双重性格，在日本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同样体现出来，使日本的现代化深深打上了文化的印记。

二 知识分子的作用

知识分子是时代的先驱，由于其阶层、职业和知识结构特点等关系，

^① 文芸春秋編『日本の論点 2003』、文芸春秋、2002 年、595 頁。

一般能站在时代前列，引领时代发展的潮流。日本知识分子阶层是推动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日本近现代文化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日本知识分子在近现代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首先体现在近代以来顺应时代潮流，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介绍和传播上。如本尼迪克特所言：“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什么地方找到另一个自主的民族，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汲取外国文明。”^①日本是以长于吸收外来文化著称于世的。固然，近代以来这种吸收外来文化的活动，与政府的组织与主持是分不开的，但另一方面，也和知识阶层的积极参与有着密切的关联。

武安隆曾撰文分析日本知识阶层在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作用和心态，认为“外来文化的吸收和移植，除了要有相当的文化水准和相应的专业知识外，还需要有对本民族的使命感和献身精神。知识分子具有较强的时代意识，他们往往以特有的敏感，在世界潮流中估量本民族所处的地位，进而做出相应的反应和积极的努力，以探索民族的进路”。因此，“大体来讲，日本知识阶层对于外来文化起着了解学习、介绍传播和改造运用的作用”。^②

近代以来，日本的一些优秀知识分子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站在时代的前列，积极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西方文化，并通过著述、翻译、讲演、办报、教学等不同方式传播西方文化。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的就是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家团体“明六社”，其成员主要有福泽谕吉、西周、加藤弘之、西村茂树、津田真道、森有礼等。他们大都出身于下级武士家庭，通晓一两门外语，并有出国游学的经历。特别是福泽谕吉，不仅著书立说，还设立庆应义塾，创办《时事新报》，终生致力于介绍、传播、移植西方文化。他前后写出《世界国尽》、《西洋事情》、《劝学篇》、《文明论概略》等著作，风靡日本社会，影响深远。福泽指出，从事西洋学的人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介绍西洋的实际情况，促使日本国民有所变通，早日进入文明开化的大门”^③。在《文明论概略》等著作中，他把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加以比较，探究日本不如西方之处，强调要“以西洋文明为目标”，注重学习西方文明的“内在的精神”，以使日本早日步入开化之境。

①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41页。

② 武安隆：《日本知识阶层在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作用及心态》，《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

③ 《福泽谕吉自传》，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88页。

到大正时代,受西方文化和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们又开始大规模介绍和移植西方文化。如大正民主主义的旗手吉野作造,在大学时代曾接受基督教的影响,后赴美留学,通过深入研究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政史、法学、政治学,考察英国君主立宪议会制度,逐渐转变为以树立立宪政治为目标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他回国后发表大量政论文章,介绍欧美宪政制度,抨击军阀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本主义,奠定了大正民主运动的理论基础。以“白桦派”作家为首的知识文化人则提倡理想主义,发起了以现代人生哲学为内容的人道主义思想运动。他们宣扬个性自由为基础的人道主义思想,力图以此来改造社会和人生,并发起“新村建设”运动,试图建立一个以“超阶级的人类爱”为基础的理想主义社会。另外,堺利彦、山川均等人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宣传,也对当时的工人农民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知识分子们的这些活动,对西方文化进一步普及和扎根于日本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于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系统宣传和介绍,在这里就更无需赘言了。

日本知识分子在近现代文化建设中的作用,还体现在维护传统文化、强调民族文化的价值上。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持续存在着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压力,所以也一直存在发掘、阐述日本文化的特性和维护民族传统的动向。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每次大规模移植西方文化的风潮之后,也都会出现大规模的向传统复归的运动。同样,在这样的向传统回归或强调传统文化价值和特性的时候,也是知识分子站在了前列。

例如,明治初年的文明开化风潮之后,19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保存国粹的运动。这个运动的中心是以三宅雪岭为中心的“政教社”,和以陆羯南为中心的“国民论派”。政教社成立于1888年,发行机关刊《日本人》、《亚细亚》等杂志,明确表示反对政府的欧化政策,反对社会上流行的欧化风潮,认为必须在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寻求民族独立的方策,尊重日本的国粹。三宅雪岭认为,只有发挥日本民族个性的价值才能实现人类的普遍理想,日本人有责任也有能力“弥补白人的不足,以进入极真、极善、极美的圆满幸福的世界”。另外,近代伦理学家和辻哲郎,民俗学家柳田国男,战后“新京都学派”的梅原猛、梅棹忠夫、上山春平,以及社会学家滨口惠俊、经济学家村上泰亮、精神分析学家土居健郎等,都是为人们所熟知的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应该指出，尽管我们在这里笼统使用知识分子这一用语，但日本近现代知识分子绝不是铁板一块，既存在着进步与保守之分，也有着体制内、反体制和体制外的区别。特别是，在现代化的大潮中，日本知识分子的立场往往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例如，随着文明开化运动的深入开展和自由民权运动的普及，当初的启蒙思想家们思想就发生了转向。福泽谕吉放弃了“独立自主”，转而提倡“官民调和”；加藤弘之放弃了“天赋人权论”，开始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西村茂树开始强调儒家道德，主张采用西洋哲学和儒教的长处，使儒家忠孝道德在新的形式下复活，成为儒教主义者。另外，像德富苏峰这样的由平民主义者转变为国家主义者，像战争时期成为政府的御用工具或被迫转向的人，以及战后像清水几太郎、江藤淳这样的转变立场的人，可以说不胜枚举。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与日本文化、现代与传统相冲突的大潮中，处处都能看到知识分子的身影。他们是文化建设的积极参与者，始终处于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交汇的漩涡中，因而他们的心态也常常是复杂和多变的。总的来说，他们一方面希望通过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吸收，使本民族赶上时代潮流，另一方面又忧虑外来文化的吸收会带来种种弊端，尤其是担心会导致丧失日本传统文化的特色。所以，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始终困扰着知识分子，是他们在文化建设过程中一直思考的问题。

众所周知，福泽谕吉在明治初年曾如醉如痴地追求西方文化，但在1878年却称：“吾人看法与（西洋文化）醉心论者全然不同，吾人对于我国不是一个新的西洋国家不唯不为之愤嫉，反为试图做西洋国家的想法而深感忧虑。”他又说：“既已有固有之文明，何故又欲加以抛弃？以固有之智力而行固有之事，兼采西洋事物以为我固有之物。且弃之者要使其极少，采之者要使其极多。”^① 陆羯南也一方面称赞“泰西文明的善美”，尤其是西方的理学、经济和实业使人羡慕，但又另一方面害怕对西方文化囫圇吞枣式的吸收可能带来危险，即日本民族将丧失自己的个性，地图上的“日本”将成为仅具空名的岛屿。谷崎润一郎也抱有同样的疑

^① 福泽谕吉：《通俗国权论》，转引自武安隆：《日本知识阶层在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作用及心态》。

虑。他说：“在感情上我喜欢东方主义，东方人无限留恋东方主义是很自然的事，但如果不想方设法加以保存并维护其独特的文化，那么东方最终将会在精神上成为西方的殖民地。然而如何使今日之诸多方面的社会组织与我们的旧传统调和起来，这正是我的一个疑问。”^①

知识分子们不仅思考，还通过长期的摸索和实践，来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例如，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出现的保存国粹的运动的代表人物三宅雪岭和陆羯南，虽然对欧化主义采取批判态度，但作为受过文明开化、启蒙运动洗礼的年轻人，他们并不全盘否定西方文明，而主张采用西方文明要“有助于日本的利益及幸福之实”。他们想用立宪君主政体来达到加强国民的统一，用保守进步主义来保持和发扬国民的特性。也就是说，他们试图将西方文明和日本文明的精华结合起来，创造“新日本文明”。至于哲学家西田几多郎将东方思想置于学问的根底并将其理论化，建立了与西方哲学融合的西田哲学，更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总之，在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分子们一方面具有试图通过吸收外来先进文化进行变革，从而赶上世界潮流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又害怕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会导致民族文化特性的丧失，充满了对传统崩溃的恐惧和不安。因此，他们在探索着合适的做法，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并在不同的领域致力于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实践，来催生新的日本文化。也就是说，“具有使命感的知识界在世界进步的大潮面前，一直进行着严肃的思考，而思考的中心始终围绕如何以适宜的方式使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实现‘对接’与融合，寻求一条既引进先进外来文化而又不丧失自身文化特色的‘两全’性的道路”^②。这恰恰是日本知识分子在近现代文化建设中留下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 民众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讲，民众作为“沉默的大多数”，与知识分子、社会

^① 谷崎润一郎：《饶舌录》，转引自武安隆：《日本知识阶层在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作用及心态》。

^② 武安隆：《日本知识阶层在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作用及心态》，《历史研究》1993 年第 3 期。

精英相比，具有某种封闭性的特点。但是，民众又是社会的基本构成，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力量。因此，如果得不到普通国民的理解和支持，任何外来的新事物和文化也难以扎根生长，任何社会精英的伟大思想也难以开花结果，任何政府的文化政策也难以推行下去。所以，民众在文化建设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普通民众由于生活在各种共同体中，生活范围相对狭窄，与政府和知识阶层相比存在信息等的不对称，所以接受新事物比较慢，容易成为新生事物的反对者，因而往往是政府和知识分子启蒙的对象。正因为如此，普通民众对政府的政策和知识分子的主张或有无奈，或有反抗，但最终往往由被动地接受到潮流的追随者，发生剧烈的变化。文明开化运动首先在城市展开，然后向农村普及，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民众的进步才代表了社会的真正进步。近代以来日本民众面向文明的文化变革，促进了包括风俗、习惯、社会观念在内的诸多领域的变革，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其作用不可低估。^①

但是，作为天然的保守主义者，普通国民是传统文化的实实在在的保存者和维护者，这也恰恰是其在文化建设中具有的特殊意义。民众一方面接受着知识分子的宣传，随着政府的文化政策前进，但他们是传统文化的无声的保存者，是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得以保存延续下来的主要力量。在现代化的大潮中，日本民众也在基层进行着艰苦的文化创造。^② 茶道、花道等传统艺术，建筑、美术、绘画、陶艺等传统工艺，作为民族文化和习俗的中心的“祭”等，被不断赋予新的形式而放出异彩，都有赖于民间艺人和民众。在思考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建设问题时，应该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评价民众的巨大作用。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了。

四 文化建设的机制

如前所述，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建设，实际上是在日本政府、

^① 広田昌希『文明開化と民衆意識』、青木書店、1980年。

^② 关于日本民众在近代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参见：色川大吉『明治の文化』、岩波書店、1970年。

知识分子和民众相互作用下实现的，是各种参与文化建设力量的合力的体现。下面，试对日本政府、知识分子、民众这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做一初步探讨。

一般来讲，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他们经常能站在时代的前列，引导着文化发展的潮流。但是，知识分子要想将自己的理念变为现实，仅仅通过他们自己的力量肯定是不行的，还需要有实践者的实践才行。因此，知识分子在文化建设中往往通过两种方法来作用于现实：其一，是宣传鼓动民众，使民众变为自己思想的信仰者和实践者；其二，是直接作用于政府，使自己的思想变为政府的政策，通过政府的政策法规现实化。当然，这两者往往不能截然分开，而是互相关联在一起。但是，大体来说，比较保守或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一般重视政府的作用，注意与政府保持一致，并推动政府形成有关文化政策；而比较进步或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则侧重于民众的作用，往往依靠民众来实现自己的主张，因此有时会受到政府的压制。

实际上，比较保守或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为实现自己的思想文化主张，往往也是既寄希望于民众，也寄希望于政府的。例如，明治初年的知识分子如福泽谕吉、西周、森有礼、西村茂树、加藤弘之等，为了推行自己的文明开化主张，一方面组织启蒙团体“明六社”，致力于宣传、启蒙民众的活动，另一方面他们又大都仕于政府，作为知识、文教官僚帮助政府制定文化政策，将其思想主张纳入到政府的文化政策中去。但是，一旦当他们的主张和言行与政府的方针相左时，他们就开始迅速转变自己的立场。启蒙思想家们在自由民权运动兴起后主动解散“明六社”，并开始抛弃自己原来的启蒙主张，立场发生了 180 度大转弯。^①应该说，像这样的保守或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在日本知识分子中占据了主流位置，如哲学家井上哲次郎、民法学家穗积八束、伦理学家和辻哲郎，以及战后的“新京都学派”等。其文化活动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维护和发扬传统文化方面，在坚持民族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现代化的进展，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成长起来。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阶层出现严重分化，从中形成了受外来文化影响很

^① 広田昌希『福澤論吉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76 年。

深的进步知识分子流派。这些知识分子一般处于在野的位置，具有浓厚的反体制色彩。如自由民权运动的思想家中江兆民、植木枝盛，大正民主主义的代表吉野作造、美浓部达吉，战后民主主义旗手丸山真男等人，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代表人物。^①另外，还有信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则是站在体制的对立面提出文化问题的。由于这些知识分子的反体制性，其思想文化主张往往会受到政府及右翼文化势力的压制或打击，不能在日本占据主流位置。但他们作为日本近现代文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对日本文化的多元化和世界化，对日本文化的现代化，起到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日本政府作为文化政策制定者、文化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往往站在实用主义立场制定文化政策，为其现代化目标和政治目的服务。但其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合作和民众的支持，因此，如何组织和引导知识分子民众，也是政府在文化建设中的经常课题。

日本政府在文化建设过程中，是比较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可以说，在近代以来日本制定文化政策时，处处可以看到知识分子的身影。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倚重，首先体现在延揽大批知识分子进入政府，使其担当重任，如明治初年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森有礼、西村茂树、西周、加藤弘之等人，都进入了政府成为知识官僚，直接参与文化教育政策的制定。另外，政府及其执政者往往还网罗和利用一些知识分子担任顾问和智囊，这在日本近现代史上屡见不鲜。特别是到战后，日本政府成立各种文化咨询机构，广泛听取知识界等精英的意见，以供制定文化政策之参考。当然，这些人物大都属于保守派和体制派，这是不待言明的。

日本政府对民众的态度具有明显的两面性，这一点在近代显得特别突出。日本政府一方面为了迅速推进现代化而实行文明开化，大力提倡学习西方文化，但同时为了调集民众的能量，加强国家和政府的凝聚力，又利用传统文化，打出天皇的旗号来号召民众；一方面不得不朝着民主主义方向改革文化教育政策，但又尽量拖延这一过程，一旦民众的要求超出了政府的预期，则对民众的要求加以打击和压制。例如，为了压制自由民权运动和人民的民主要求，明治八年发布了“谗谤律”和

^① 荻部直『丸山真男：リベラリストの肖像』、岩波書店、2006年。

“报纸条例”；在发布普通选举法的同时，还制定了治安维持法。至于法西斯时期的文化统治，就更不用多说了。当然，这些在战后发生了很大改变，国民的文化权利受到宪法保护，政府在制定文化政策时越来越要考虑到国民的文化需要了。

知识分子、政府和民众三者的相互作用关系，也会因不同时期而有不同的表现。一般来讲，在面临民族危机时，在知识分子和政府以及民众之间出于民族利益的一致，较少出现矛盾和摩擦，如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运动。正因此，文明开化运动才取得了那么大的成果。但在对外战争时期，政府往往实行文化统制政策，知识分子和民众被纳入政府的文化政策轨道，受到严厉的文化控制，从而失去或难以发挥文化创造的自由。例如，在日本全面侵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者都受到镇压而被迫转向，走向了大政翼赞的道路。而在和平时期，往往出现不同的意见和主张，特别是随着知识分子阶层的独立，人民大众文化素养的提高，就更是如此。这时，不同阶层、不同势力的文化追求往往不同，文化发展和文化建设实际是一种折中的结果。当然，政府在这里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并没有改变。

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知识分子和民众在文化建设过程中的地位日益提高。虽然日本政府仍掌握着决定文化政策的主导权，但在民主主义制度下，不能无视民众的文化需求。政府开始重视民众的舆论，民众的文化要求也通过各种渠道传达出来。另外，政府成立各种文化咨询机构，延揽各界知识精英，探索日本文化的发展战略，并以他们的咨询报告作为制定政策、法律的参考或依据。^① 这样的变化，为日本文化在新时代的发展准备了较好条件。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文化的建设和发展都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探讨和建立推进文化建设的长效而有力的机制。

（责任编辑：洪 鸿）

^① 参见崔世广：《关于日本文化战略的探索》，台湾义守大学《人文与社会》，2006 年 7 月 15 日。

中日両国のFTA 戦略に関する比較分析

徐 梅 趙江林

1990年代末以来、地域経済の一体化が急速に進められ、FTAの潮流がますます高まりを見せ、東アジアにおける経済協力が進展を続けている。中国も日本も地域経済協力及び一体化のプロセスに積極的に参加するとともに、FTAに関する戦略と政策を制定し、実施している。中日両国のFTA戦略には、共通点と利益の融合点がある同時に、社会制度、経済体制及び発展段階、国家利益などの差異により、相違点と利益の衝突もある。

文化交流、価値理念と歴史認識問題

——戦後中日関係における精神的要素について

胡令遠

歴史認識問題と価値理念の相違は、戦後中日関係の精神面での脆さを表している。この二つの要素は各時期の中日関係に影響をもたらした。冷戦後、とりわけ小泉純一郎内閣の時期に、価値理念がますます日本政府の対中国外交における重要な要素となっており、「新たな基軸」、「新たな柱」という戦略の高さにまで引き上げられている。福田康夫元首相は、この傾向を是正し、その任期内において、近代以来大きく乖離していた中日間の精神的主脈が初めて積極的な接近を見せた。福田元首相は中日両国間の精神価値の再建に多大な力を注ぎ、非常に貴重な外交遺産を残した。

日本の近代化過程における文化建設 の主力及びその作用メカニズム

崔世広

日本の近代化過程における文化建設の問題をめぐって、各種の勢力がそれぞれ異なった角度から、様々な論点と主張を提出している。各種の勢力と論点の相互対立と統一が、日本近代化過程における文化建設の色彩豊かな画面を織りなしてきた。本稿において日本政府、知識人及び民衆の役割について重点的に考察し、それを踏まえて、その相互作用の視点から日本の文化建設のメカニズムについて検討してみたい。